明代對外交往中的詩歌態度*

郭萬金 趙寅君

山西大學文學院

明代是中國對外交往歷程中最應注意的時代，但明代詩歌卻未對此表現太多的熱情，更多的只是延續著傳統詩歌的一般慣例。在詩歌「多識」功能下對番邦異物的關注稱詠雖然不乏，但其中亦包含了異樣的卻貢思想。對於明代對外交往中的幾個重要事件，陳誠出使西域、鄭和下西洋、傳教士入華，明詩亦僅是以其一貫的廣袤視域，慣例般地將其納入詩歌傳統中。並不積極的明詩關注作為一種特殊的切入視角表現出相當的詩史意義與詮釋張力。

關鍵字：明代 詩歌 對外交往 態度

* 項目來源：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

明人於本朝外交充滿自豪，信心十足：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烏思藏、童卜韓、胡奴兒于諸司，朵顏、赤斤、阿端、卜刺罕諸衛，奉法尤謹，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¹

對於詩歌，明人卻沒有那樣的充足的底氣，有明一代，敢將明詩拿來炫耀的頗為有限，至多不過以承接李唐為念。詩歌既非明人的主流訴求，亦非明人歷史意識中願意自我標榜的重點，更多的是明代士人的身分象徵符號和行為規則，是一種知識譜系的慣例，一種習慣文體下的情志表達。² 作為一代詩歌，明詩雖然缺乏審美視野的突破，卻有著無法回避的詩史意義。然而，詩歌的敘述並非歷史記錄的全視角，而是一種表現態度的個性折射，儘管無法像史實之鏡那樣的全面反映，然而，對於複雜的歷史而言，對於夾雜著文化理解、民族情緒、個人感情的敘述對象而言，尤其是關注物件本身處於邊緣地位的時候，這樣的折射視角往往更能凸現詩史的意義與詮釋的張力。

一、詠物的慣例

中國詩歌的詠物傳統自然導源於《詩》三百。「古之詠物，其見於經。則灼灼寫桃花之鮮，依依極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淒淒擬雨雪之狀，此詠物之祖也。」³ 經典開啟的傳統獲得了聖人的認可，「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

1 敖英：《東谷贅言》，《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上，頁14。

2 關於明代詩歌的整體論述，請參看拙文《關於明詩》，《文學評論》2005年第5期，頁100-117。

3 俞琰：《詠物詩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4年），頁1。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多識」成為《詩》在經學傳統中特許的一項功能，除了在經學中以博物的形式延續外，更成為中國詩歌體式的一種重要門類。標舉「多識」的詠物傳統誠然放大了詩歌的視野，許多新異事物，即在「多識」的功能許可下被納入詩歌傳統。天朝意識雖然一貫自詡地大物博、無所不有，但「蠻夷」中有不少天朝所未曾經眼的新異事物，卻也是不爭的事實。「互通有無」是天朝不願接納的觀念，但和平主義下的朝貢制度卻使得域外的新奇事物有了正當合法的輸入背景。「多識」功能與「入貢」姿態的有效結合，使得異邦中新奇事物以體面的身分進入中國詩歌的大雅之堂，歷代吟詠不絕，如寶馬、獅子、倭刀、香料等貢品無不成為中國詩人的形容對象。明詩亦不例外，一如既往地延續著中國詩歌的詠物傳統，不乏熱情地關注著番邦異物。如夏原吉（1367-1430）聖德瑞應詩 稱：

聖主膺乾運，垂衣馭八區。道隆堯舜比，功茂禹湯俱。
蕩蕩三邊肅，熙熙兆姓娛。普天歌至治，率土發靈儲。
爰有諸蕃國，能忘萬里途。隨槎超瀚漫，獻瑞效勤渠。
渺渺來中夏，惓惓覲帝居。麒麟呈玉陛，獅子貢金鋪。
紫象靈山種，驂騮渥水駒。駝雞同鸞鷲，文豹擬騶虞。
福祿身紆錦，靈羊尾載車。霜姿狷更異，長角獸尤殊。
彩檻竒音鳥，雕籠雪色烏。玄龜三尾曳，山鳳五花敷。
日上龍墀麗，風回鳳閣迂。禮官躬典設，蕃使肅奔趨。
仙掌開丹扆，祥煙散紫衢。重瞳欣一顧，百辟震三呼。
茲豈尋常致，端由治化孚。既將昭帝德，尤足壯神都。
炎漢何能擬，姬周莫並驅。拜瞻嗟慶倖，稱讚媿荒疎。
惟願皇風洽，仍祈化日舒。鴻圖千載固，聖壽萬年餘。⁴

4 夏原吉：《忠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40冊，卷二，頁496b。

唐順之（1507–1560）日本刀歌 稱：

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須作靶青絲綆。
 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藻荇。
 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冏冏。
 毛髮凜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聞道倭夷初鑄成，幾歲埋藏擲深井。
 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冰鬥清冷。
 持此月中斫桂樹，顧兔應知避光景。
 倭夷塗刀用人血，至今斑點誰能整。
 精靈長與刀相隨，清宵恍見夷鬼影。
 邇來鞞鞞頗驕黠，昨夜三關又聞警。
 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頸。
 古為神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試韜穎。⁵

其中，獅子則是不少文人競相吟詠的對象，如楊榮（1371–1440）獅子：

聖朝統六合，威德被遐荒。鳥獸既咸若，萬物沾恩光。
 獅子產西極，雄猛非尋常。鋸牙自銛利，銅首何軒昂。
 雙耳正上聳，兩目耀星芒。巨尾搖錦茸，長毛絢金黃。
 顧盼雄風生，哮噉百獸藏。及茲來闕下，俛首隨鵷行。
 帖然自馴服，感此仁化彰。玉階齊率舞，靈囿恣翱翔。
 仰惟聖明世，物類皆踴躍。永言樂熙皞，天地同悠長。⁶

夏言（1482–1548）獅子：

金眸玉爪目懸星，群獸聞知盡駭驚。
 怒懾熊羆威凜凜，雄驅虎豹氣英英。

5 唐順之：《重刊荊川文集》，萬曆刊本，卷二，頁22。

6 楊榮：《文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卷一，頁12b–13a。

曾聞西國常馴養，今出中華應太平。
卻羨文殊能服爾，穩騎駕馭下天京。⁷

此外，如獅子賦、獅子贊之類的文字亦屢見於明人筆端。但無論是頌美祥瑞的吹捧粉飾，還是刻畫入微的托物言志，背後所隱藏的天朝態度與多識功能，都可稱得上是古典詩歌的詠物傳統的習慣延續。但中國詩歌的關注視角絕不停留於「多識」層面的一般知識擴充，在對外交往中凸現的天朝意識，於國家內部的哲學理念中卻有著另樣的詮釋。在「貢獅」事件的明詩關注中，自然也就有了異樣的聲音，如袁（1502–1547）觀魯迭所貢獅子歌曰：

魯迭迢迢，遠在昆侖西，叩關通道貢狻猊。
絕漠知重幾萬譯，跋涉流沙經月氏。
初從羈縻就屬國，傾城聚觀途路塞。
攀題械脰苦維繫，豹鞞為鞞鐵銜勒。
尾如流星氣憑陵，隅目燭地思奔騰。
四蹄蹇蹇毛髮竦，瘦脊砗兀排鋒棱。
崩雷掣電望風吼，青兕辟易元羆走。
嗇夫股栗不敢前，壯士變色將無狃。
奚奴綠髯深眼睛，戟手魁髻垂胡纓。
須臾鞚引藁街下，俯首貼耳猶長鳴。
剗羊屠狗恣所欲，豐芻肥截日不足。
英雄束縛亦如此，豢養恩深敢辭辱。
始知丹青貌不同，彷彿山海圖經中。
上林已開射熊館，天子賜見長楊宮。
虎賁如雲兵衛列，強弩短刀防噬嚙。
詔謂圉人破檻車，玉階舞蹈龍顏悅。
我聞異物不可馴，袒裼擾之如有神。

7 張玉書：《佩文齋詠物詩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4冊，卷三九九，頁386b。

水衡寶鑑勅頒賜，不惜金錢懷遠人。
 嗚呼！明王慎德卑遠略，珍禽奇獸須教却。
 周征白狼荒服叛，漢閉玉門歌頌作。
 先朝故事傳敬皇，魯迭歎塞曾來王。
 當時謝却仰明聖，萬古史冊生輝光。
 今皇端拱勤內治，夷德無厭惟嗜利。
 何當破械縱山林，厚賞金繒絕來使。⁸

吳寬（1435–1504）西域賈胡以獅子入貢有詔卻之次韻鳴治 稱：

萬里流沙奇獸去，數行新詔滿朝歡。
 須知此物真無益，始信為君亦不難。
 盛世糞田曾卻馬，⁹ 他人野鳥¹⁰ 自稱鸞。
 即看重譯皆歸化，敵國何方是契丹。¹¹

張治道（1887–1956）嘉靖丙戌六月五日京兆驛觀進貢獅子歌 稱：

嘉靖中葉稱至治，海內紛紛多異瑞。
 天子雖閉玉門關，狡狴猶自遠方至。
 嗚呼！此物胡為來？鉤爪巨牙身崑崙。
 忠順丘墟土番叛，西域之國絕貢獻。
 月支疏勒稱西極，此物十年達中國。
 目光如電眾所驚，踞地咆哮天為黑。
 傾都之人盡來觀，我亦走馬入長安。

8 朱彝尊選編：《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四十，頁1968–1969。

9 此處用《老子》：「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之意，王弼注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10 此處用《尚書》典，採伏生《尚書大傳》之意，其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鼎耳而雉。問諸，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辮髮、重譯，至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見孫之驥輯：《尚書大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卷二，頁398b。

11 吳寬：《匏翁家藏集》，正德刊本，卷十七，頁12。

長安市人色無歡，為道食羊責縣官。
 一时无羊人遭鞭，羊備猶索打乾錢。
 高鼻番人眼如拳，錦衣繡褲赤檻前。
 有時玩弄口生煙，猛烈驚奔聲震天。
 百獸躑地虎豹痛，雞犬不復鳴青田。
 狻猊之外有青兕，四十年前曾過此。
 異像常聞父老傳，奇形尚在丹青裡。
 噫嘻！先皇好搏獸，豹房虎圈親來鬥。
 自謂真龍虎敢當，挽衣一近遭虎傷。
 至今海內傳其事，嗚呼此物安足視！
 鳳凰絕鳴，麒麟不遊。
 牛馬不蔽野，狻猊達皇州。
 我來觀罷生繁憂。¹²

袁氏歌行長篇，描繪刻畫，曲終奏雅，歸於勸誡，自是譎諫傳統；吳氏七律短制，借《道德》玄言，漢儒經解，力主無為德化，以古喻今，亦為詩家常法。張作樂府篇章，感事而發，直筆鋪敘，語含怨刺，卻是諷喻精神。三作或急或緩，或雅或俗，風格迥異，關注卻同，殊途同歸的「卻貢」主旨所體現正是明代精英階層對朝貢體制的積極反思，而不絕於史的「卻貢」之請恰可與之輝映，在詩歌與史實的張力中，大略可勾勒出一般知識背景下的明代士人於朝貢的關注。

弘治年間，面對諸番不斷的貢獅行動，朝臣先後進言卻貢，《明史》載：

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1524）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生卒年不詳）言：「魯迷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卻之，以光聖德。」¹³

12 錢謙益撰，許逸民等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丙集第十一，頁3520-3521。

13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三三二，頁8626-8627。

御史張祿（生卒年不詳）言：

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況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相食與食人食，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為拂經。乞返其人，卻其物，薄其賞，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之意。¹⁴

精英們的「卻貢」思路並不複雜，大臣奏疏與士人詩歌的思考模式、判斷理由大略相近，或由祖宗成法以懷疑入貢者身分，或以君王的品行要求否定其朝貢意義，或以代價高昂的實際支出論證其不可行性。智識階層於朝貢體制的反思大抵如此，於體制之後的天朝意識並無關涉。於此，我們卻不能苛求古人，所謂「哲學的突破」必須有相應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觀念、學術以及外部刺激等一系列內外因素的合力才能出現。即便是天才，同樣需要也適宜的生態，才有可能超越固有的知識背景，對於八股理學浸潤下的封建士大夫而言，要求他對作為其基本知識背景的組成部分之一的天朝意識進行反思，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依照儒學路徑的認真實踐的明代知識階層，從未放棄天朝子民的身分，而是由儒家由己及人，由內而外的觀察視角，在輿觀群怨的傳統支持下，以古典詩歌的美刺精神，在詠物的慣例中反思朝貢的現實意義。儘管批評的思想資源、表現方式並不出傳統範疇，但頌美之音中的異樣的聲調卻已展露了明代士人於對外交往中的態度。

二、陳誠使西域

與詠物詩「因物見世」的切入角度相異，紀行詩所採用的是「以人觀景」的關注視角，其中自有「多識」傳統的延續，卻已多了些詩人主體的眼光剔汰。作為古代詩歌的一大板塊，紀行詩的核心關

14 同上注，頁 8627。

注雖不在交往，然而，當詩人身處異域，經常人所未經，睹常人所未睹時，作為詩人視野之歷史呈現的紀行詩無疑有著更為凸現的詩史意義，實為對外交往中不可或缺的詩歌關注。自張騫鑿空，西域漸為中華熟識，紀行述異，歌詩不絕，有明一代，以「轍跡遍四方」的吉水陳誠（1365–1457）出使西域次數最多，且有《西域往回行詩》92首及《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頗具規模。

陳誠出身儒門，受學於元儒梁寅（1303–1389），洪武二十七年（1394）中進士，交友於方孝孺（1357–1402）、解縉（1369–1415）等，自是儒生本質，其 至哈烈城 詩即稱：

白首青衫一腐儒，鳴騶擁旆入西胡。
 曾因文墨通明主，要紀江山載地圖。
 中使傳宣持至節，遠人置酒滿金壺。
 書生不解侏離語，重譯殷懃問汝吾。¹⁵

使節扮相下依舊是書生面目，對「文墨」頗具幾分自信的陳誠更在自己的詩作中身分妥帖地延續著古典詩歌紀行傳統。儒學譜系中的使臣典範自是其心儀物件，如 過川謠 稱「蘇武邊庭十九年，燁燁芳名垂萬古」。¹⁶ 出京別親友 稱：「丹心素有蘇卿節，行囊終無陸賈裝。」¹⁷ 望哈烈城 其一稱：「異俗殊風多歷覽，襟懷不下漢張騫。」¹⁸ 八剌黑城 稱：「博望早封侯，蘇卿老歸國」；¹⁹ 出使途中的奇觀異景自然也是筆下之物，如 火焰山 云：「一片青煙一片紅，炎炎氣焰欲燒空」。²⁰ 流沙河 云：「無端昨夜西風急，盡卷波濤上小崗」；²¹ 所經邦國的別樣風俗更為紀行慣例，如 至撒馬兒罕國主

15 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第26冊，內篇卷二，頁343b。

16 同上注，頁338b。

17 同上注，頁336a。

18 同上注，頁343b。

19 同上注，頁342a。

20 同上注，頁339a。

21 同上注，頁339a。

兀魯伯果園 言：「加跌坐地受朝參，貴賤相逢道撒藍。不解低頭施揖讓，惟知屈膝拜三三」；²² 去國離鄉的別愁鄉思自是人之常情，如 九日 曰：「路入窮荒三萬里，身離上國一周年」，「閑倚窮廬凝遠目，鄉心歸雁夕陽邊」；²³ 又歎 其二曰：「去路迢迢鄉國遠，歸心切切簡書遲」；²⁴ 報國建功的壯志情懷更是屢現筆端， 八刺黑城 云：「但祈功業成，勤苦奚足惜。願言播芳聲，千古垂竹帛」，²⁵ 又歎 其一云：「定遠成功心事苦，中郎仗節鬢毛斑。今人好踵前人跡，共著芳名宇宙間」。²⁶

縱觀陳誠詩作，大多詞意妥帖，敘述明晰，時見性情，切合身分，如其 獅子 詩稱：「自古按圖收遠物，不妨維繫進吾皇」，²⁷ 所作 獅子賦 亦以「天朝非維遠物之是珍，實表外夷之慕義也」²⁸ 為念，以撫遠招貢為旨的陳誠於番邦異物所持態度自不同於主張卻貢的士大夫，天朝意識下的上國形象維護是其出使之最高使命，自為其核心關注。宣播王化的使命自任最是天朝使節身分下儒臣心態的真實寫照，如 過卜隆古河：「願祝聖皇千萬壽。誕敷聲教及天涯」，²⁹ 哈密城：「聖恩廣闊沾遐邇，夷貊熙熙樂太平」，³⁰ 土爾番城「九重雨露沾夷狄，一統山河屬大明」，³¹ 八刺黑城「吾皇敷德教，信義行夷貊」，³² 俺都淮城：「九天施雨露，四海沐恩波」。³³ 過忽蘭打班：「暫紀官程歸故國，共知王化被遐方」。³⁴ 詣哈烈國主沙哈魯第宅「從此萬方歸德化，無勞征伐定三邊。」³⁵ 和平主義的安

22 同上注，頁 341b。

23 同上注，頁 338b。

24 同上注，頁 343a。

25 同上注，頁 342a。

26 同上注，頁 343b。

27 同上注，頁 344a。

28 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內篇卷一，頁 334b

29 同上注，頁 338a。

30 同上注，頁 338a。

31 同上注，頁 339a。

32 同上注，頁 342a。

33 同上注，頁 343a。

34 同上注，頁 346a。

35 同上注，頁 344a。

邊主張正是儒家仁義學說的投射，俺都淮城：「玉帛梯航貢，車書仁義摩。安邊寧口舌，制勝豈干戈。」³⁶ 望哈烈城：「皇威到處邊城靜，何用嫖姚百萬兵」。³⁷ 陳誠的進士出身、吉水籍貫，以及永樂帝的熱情關注，使得他的每次出行都博得了當時名流的關注，王直（1379–1462）、胡廣（1369–1418）、周孟簡（1377–1430）、鄒輯（1337–1412）、胡儼（1360–1443）、金幼孜（1367–1431）等紛紛作詩送行，所作雖多為頌聖稱功、勉志壯行，卻也蔚然稱盛，堪作明人天朝心態之集體展露。

需要指出的是，陳誠詩作的光彩多在西域行程的詩史意義，卻已被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³⁸ 等掩去大半，陳誠亦頗為得意地自稱，「絕域道途三萬里，殊方風俗幾多般。回朝若問西夷事，只好《行程記》裡看」。³⁹ 陳誠全部詩歌數量不過一百餘篇，官位亦不顯，最終不過從四品的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再加上永樂之後，明代對外交往的全面收斂，這位休居近三十年的出色使臣竟被歷史所忽略，《明史稿》中的傳記並未被《明史》採納，而原本就不太凸現的詩人身分更是為人遺忘，以至極具明代詩史性質的《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紀事》諸作均闕漏不錄。史載闕如的緣由誠多，而知識階層的態度與關注於中亦可見一斑。

三、鄭和下西洋

謝國楨（1901–1982）先生曾言：「世徒知鄭和（1371–1433），之乘槎南洋，而不知陳誠、李暹（1436–？）之奉使西域，其功不

36 同上注，頁 343a。

37 同上注，頁 343a。

38 雖《四庫全書總目》稱《使西域記》（《西域番國志》之刪節本）「其所載音譯，既多訛舛，且所歷之地，不過涉嘉峪關外一二千里而止。見聞未廣，大都傳述失真，不足徵信」，但清人唐肇在《藏記概·敘》卻稱：「舉昔人記注外國之書，惟陳員外《西域使程記》，稍為典實。蓋其身歷，非采摭傳聞者可比，故史家不得棄之。」而《明史·西域傳》亦多因其書而成。

39 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內篇卷二，頁 337a。

減於和」。⁴⁰較之陳誠，鄭和的確幸運了許多，不但《明史》有傳，且「蓋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劇戲，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之流為丹青耳」，⁴¹就國家意志言，下西洋於天朝禮治下的教化遠播，上國形象的積極塑造，君王心理的虛榮滿足不無意義，就民間觀念言，西洋行程中的奇聞逸事，異域景物，番邦風俗，無不迎合民間之好奇心理，成為佐談資料。而朝貢貿易背後禁而不絕的私人貿易亦因之發展，間接刺激民間經濟繁榮的鄭和更成為世俗話題的中心人物。⁴²就歷史評價言，七下西洋的壯舉誠為中國外交史、世界航海史之豐功偉業，毋庸多言。但是，這樣一場壯觀的海洋活動並未引起精英階層的太多關注，有明一代，關於鄭和西洋事的吟詠實不多見。

在七次航海的隨行者中，能歸以志事，得以流傳者，不過會稽馬歡《瀛涯勝覽》、太倉費信（1384-？）《星槎勝覽》、應天鞏珍（生卒年不詳）《西洋番國志》三書，史籍如此，詩作就更為寥寥了。鞏珍無詩，馬歡有一首頗具影響的紀行詩，其曰：

皇華使者承天敕，宣佈綸音往夷域。
 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極。
 洪濤浩浩涌鯨波，群山隱隱浮青螺。
 占城港口暫停憩，揚帆迅速來閩婆。
 閩婆遠隔中華地，天氣煩蒸人物異。
 科頭裸足語侏僂，不習衣冠疏禮義。
 天書到處多歡聲，蠻魁酋長爭相迎。
 南金異寶遠馳貢，懷恩慕義摠忠誠。
 閩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齊過臨五嶼。
 蘇門答刺峙中流，海舶番商經此聚。

40 謝國楨：《明清 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140。

41 錢曾：《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頁66。

42 「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見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九，頁324。

自此分鯨往錫蘭，柯枝古里連諸番。
 弱水南濱溜山國，去路茫茫更險艱。
 欲投西域遙凝目，但見波光接天緣。
 舟人矯首混西東，惟指星辰定南北。
 忽魯謨斯近海傍，大宛未息通行商。
 曾聞博望使絕域，何如當代覃恩光。
 書生從役可卑賤，使節叨陪遊覽遍。
 高山巨浪罕曾觀，異寶奇珍今始見。
 俯仰堪輿無有垠，際天極地皆王臣。
 聖明一統混華夏，曠古於今孰可倫？
 使節勤勞恐遲暮，時值南風指歸路。
 舟行巨浪若游龍，回首遐荒隔煙霧。
 歸到京華覲紫宸，龍墀納拜皆奇珍。
 重瞳一顧天顏喜，爵祿均頒雨露新。⁴³

敘事條理，紀行述異，天朝心態於中屢現，雖此詩之歸屬權收到當代學者的質疑，然自有其史料價值存焉。費信則在其《星槎勝覽》中，「采輯諸番風俗、人物、土產之異，集成事序，詠其詩篇」，凡四十四首，費信之詩，附於敘事之後，為總括之意，詩文相映，足備詩史，《星槎勝覽》用心本在：

中國之大，華夷之辨，山川之險易，物產之珍奇，殊方末俗之卑陋，可以不勞遠涉而盡在目中矣。夫王者無外，王德之體，以不治治之。王道之用若然，將見治化之效，聲教所及，暴風不作，海波不揚，越棠肅慎之民曰，中國有聖人在上，白雉楛矢之貢，不期而至矣。⁴⁴

亦是王化宣教之正統思路，其詩於描述之中，不無天朝心態，如

43 馬歡著，馮承俊校注：《瀛涯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1-2。

44 費信著，馮承俊校注：《星槎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11-12。

占城國 即稱：「聖運承天統，雍熙億萬春。元戎持使節，頒詔撫夷民。莫謂江山異，同沾雨露新。西連交趾塞，北接廣南津。酋長尤崇禮，聞風感聖人。」⁴⁵ 費信年十四即代兄從軍，雖出身低微，然其志篤好學，頗具「采摭裁詩句，摠誠獻紫宸」⁴⁶ 之弘願，所作「尤念蒼生志，承恩覽遠邦。采詩雖句俗，誠意獻君王」，⁴⁷ 適為寫照，其詩以耳目 記，圖繪殊方風物，實堪與陳誠之西域紀行詩並為中西交通史之詩歌雙璧。

明詩於鄭和下西洋的關注似乎亦大抵如此，實無熱情，即便馬、費之著作亦不過以野史視之，⁴⁸ 其詩就更不足為道了。元末明初詩人袁華（1316-？）有 送市舶官：

諸番之國南海陰，島居卉服侏儻音。
 雕足椎髻金鑿齷，獷鷲如獸那可馴，稼穡萬斛檣林林。
 夏秋之交來自南，象犀翠羽珠貝金，蘇合熏陸及水沉。
 皇元率土罔有刑，三邊擾攘興甲兵。
 梯航梗阻民弗寧，重臣分閫號令申。
 殊方慕義相附親，呵叱鯨鯢驅鯢鱣，海不揚波如砥平。
 婁東太倉吳要津，襟帶閩粵控蠻荆。賈胡夷蜚貢贄琛，
 關譏互市什一征。撫綏覆育德澤深，猶慮苛細失厥心。
 夫君矯矯東南英，溫恭廉潔邁等倫。
 承命監眎慎章程，兩周星霜秋復春，
 長涂蕭蕭征馬喧，回轅不載蕙苾行。
 夫君夫君明且清，自茲步武趨王庭。
 上陳民瘼摠忠誠，願化愁歎為驩聲。⁴⁹

45 同上注，頁 4。

46 同上注，頁 4。

47 同上注，頁 26。

48 祝允明《前聞紀》稱，「永樂中，遣官軍下西洋者屢，當時使人有著《瀛涯一覽》、《星槎勝覽》二書以記異聞矣。」（《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 72-73。

49 袁華：《耕學齋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2 冊，卷七，頁 323b。

所述即為鄭和航海之起錨出發地——太倉劉家港，所稱美的卻是元代的市舶官，雖可視為下西洋之預演，情形類似，態度迥異。這樣的詩歌熱情終究沒有與鄭和有任何的關聯。

明詩對「西洋」的冷漠自然與鄭和的太監身分有關，朱元璋（1328–1398）以歷代宦官亂政為戒，即規定宦官「不得識字預政，備掃除之役而已」，⁵⁰ 文化水準較低的宦官詩文修養極為有限，於詩歌亦無太多的興致，鄭和亦不例外。明成祖（1360–1424）「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以使西域而言，正使為中官李達（生卒年不詳），陳誠不過佐行。於此，士子頗有微詞，在朱棣欲遣內官出使朝鮮時，御史侯英即以「其人多讀書知禮，使非其人，必為所輕。……乞追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副之」。⁵¹ 然而，對於朝貢典範——朝鮮的特例並不普遍，「永樂時星槎四出，輪航不輟，大都貂璫鴟弁也。雖特遣庶曹，仍冠以內侍，其習沿而未變」。⁵² 歷史敘述的紙背後暗含著不滿，況且，士大夫的心理中歷來有鄙薄太監的傳統，恥與結交，詩文應酬本就稀少，雖礙於君王的顏面，不便直接表露，卻足已造就詩歌的冷漠態度。

朝貢制度的實際生命力與召喚力實在於「厚往薄來」的招徠政策，「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⁵³ 明人於此亦多有察覺，歷朝奏章中關於蠻夷貪利的論述雖不絕於筆，但天朝顏面的維護始終橫互於胸，袁 觀魯迭所貢獅子歌 中已有「夷德無厭惟嗜利」的關注，但開出的藥方仍不過是「厚賞金繒絕來使」，「厚賞」本是招徠的極大誘惑，其與「絕來使」之目的矛盾處，正是天朝朝貢體制之軟肋。相比之下，處於天朝意識之外的利瑪竇的觀察顯然更為客觀深刻：

50 張廷玉：《明史》，卷九十五，頁2341。

51 朱國禎：《涌幢小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三十，3814–3815。

52 談遷：《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九十五，頁1094。

53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三三一，頁2602。

為數眾多的來賓並不是以真正的使節資格到中國來的。他們來是為了賺錢，帶來禮物並希望皇帝賞賜。為了不失偉大君王的尊嚴，這些賞賜遠遠超過他所收到的禮物的價值。他們把收到的錢用來購置中國商品，然後拿到他們本國出賣，獲取大利。而且他們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的開支就都由公款報銷。看來中國人想照顧這些使節，或者不如說這些商人，其惟一目的就是要控制鄰國，因此他們向皇上進貢什麼樣的禮物倒似乎是無所謂的。……然而這些蠻夷從老遠帶來這樣一些瑣細的東西卻使國家為他們路上的開支花費了一大筆錢。好像中國人重視的倒不是這些自稱使節的低下地位，而是炫耀他們君主的偉大。⁵⁴

然而，即便是國力貧弱的趙宋王朝尚且頑固地支撐著天朝的顏面，

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⁵⁵

力圖「復三代之舊」，⁵⁶ 規模漢唐盛世的明帝國於此更不甘示弱，朱元璋曾言：「遠夷跋涉萬里而來，暫而鬻貨求利，難與商賈同論，聽其交易，勿征其稅」，⁵⁷ 「凡海外諸國入貢，有附私物者，悉揭其稅。」⁵⁸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

54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13-414。

55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分五，頁13981-13982。

56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卷十五，頁1。

57 同上注，卷五十七，頁1。

58 同上注，卷一五九，頁4。

矣。」⁵⁹ 明初君王的關注乃在承運開國的煌煌氣象，四方咸賓的升平氛圍，在極度膨脹的天朝意識中，實際的經濟利益並不在考慮之中，同時，君子不言利的儒學傳統亦為「厚往薄來」的朝貢原則提供了合理合法的辯護。宣諭王詔、頒賜銀物、鼓勵入貢諸事幾乎是鄭和每過一地的必行慣例，更是不計得失的天朝交往行為。二十八年的七下西洋，毫無疑問地營造了明王朝的上國形象，卻也代價不菲，「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中國」，⁶⁰ 國力耗損極大。

更重要的是，充溢府庫的貢物遠遠超出了皇室的消費能力，於是便成為百官的賞賜品，洪武二十三年（1390），「賜在京文武官四千八百餘人高麗布各一匹」，⁶¹ 永樂三年（1405），「賜文武百官西洋及高麗布有差」。⁶² 如此大規模的賞賜行為實已顯露了貢品的過剩，仁宗（1378–1425）繼位後，胡椒、蘇木等貢物亦成為賞賚之物，⁶³ 單一的賞賜可以處理過剩的貢品，卻不能減少國庫的支出，折支官員俸祿便成為在維護天朝顏面的前提下，解決貢品過剩與財政消滅的首選方案。朝廷規定「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⁶⁴ 宣德九年（1434），更具體規定了胡椒、蘇木的折鈔比例，南北二京官員各於當地府庫支付，⁶⁵ 這些對於原本俸祿就不高的明代官員實是不小的刺激，面對一堆無用的胡椒、蘇木，除了折價處理，再遭受一次經濟損失外，並無他法。

國家利益與個人收入的雙重關注下，交往中的實際利益開始進入士大夫們的視野之中，除了在要求減輕朝貢的次數、賞賜的力度外，對於貢物的給價也仔細核算，力求合理，於鄭和西洋事自無好感。永樂時，文臣鄒緝（？–1422）即借三殿火災指責朝廷歲遣內

59 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六，頁106。

60 《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卷二三六，頁2。

61 《明太祖實錄》，卷二〇二，頁4。

62 《明太宗實錄》，卷六十五，頁5。

63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七十六，頁1456。

64 黃瑜：《雙槐歲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九，頁250。

65 《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卷一一四，頁1。

官齋往外番收貨：

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⁶⁶

又焦竑（1540–1620）《玉堂叢語·卷五》載：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為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都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⁶⁷

此事亦見於陸樹聲（1509–1605）《長水日抄》、嚴從簡（生卒年不詳）《殊域周咨錄》，惟詳略不同。明代士大夫於鄭和航海的态度由此可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⁶⁸若非礙於君王顏面，士子的腹誹恐怕已遍及詩文了，冷漠的詩歌態度更多的是「為尊者諱」的傳統保持，其中或者也暗含著幾分從天朝心態層面上對鄭和事業的認可。

66 程敏政：《明文衡》，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刊本，卷六，頁23。

67 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五，頁150。

68 梁啟超：《鄭和傳》，《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六冊，專集第九，頁3。

四、傳教士入華

在天朝意識下的朝貢制度中，所有交往物件都被列作蠻夷之邦，根本無法和中國取得對等的地位。而在交通技術的限制下，能夠建立比較頻繁的往來關係的範圍也不過周邊數國，在漫長的千年歷程中，天朝也未曾真正遇到一個可以在各方面和自己相匹敵的真正對手，「中」、「西」完全是兩個不平等的感念，二者之間也不可能產生平等並置的對話平臺。鴉片戰爭後，接踵而至的民族災難粉碎了天朝上國的一貫形象，崩潰了中國中心的世界觀念，國人開始正視西方，並在危機的壓力下喊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中西二字的聯用才日趨普遍。語義學的簡單追溯所透視出的是封建時代對外交往觀念中的不平等性。然而日後震撼東方的西學正是這種不平等的觀念下進入中國的。

當疲憊的明帝國在不失天朝體面的預設心態中，停止了鄭和的航海活動，開始縮減朝貢規模的現實思考時，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1524）、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 1451–1506）、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的世界遠航已將東、西方的正面相遇提上議程，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全球化時代的交往帷幕，宗教改革後的耶穌會士在虔誠而堅貞的信仰中開始了基督教文明與儒家文化的首次對話，1552年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在上川島望華而逝，1557年，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開始在澳門傳教，1582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獲准在肇慶建立教堂，前輩不懈累積的適應性傳教策略集大成於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這位出色的義大利神父，以其對中國文化的敏銳觀察、深刻領悟，明智而恰當地選擇了中國化的傳教方式，成功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傳統。在瞿太素（生卒年不詳）建議下，利瑪竇蓄發留須，脫僧袍，戴儒冠，穿儒服，形象的貼近為利瑪竇與士大夫的交往增添了相當的親和力，但真正對話平臺的搭建則來自於利瑪竇對中國典籍的熟悉，張爾歧（1612–1678）《蒿庵閒話》稱利瑪竇「四子五

經皆通大義」，⁶⁹ 應搗謙（1615–1683）天主論 稱其「盡通經史之說」，⁷⁰ 借助中國本土的話語資源，利瑪竇在閒談交流中以非群眾形式的隱蔽方式來佈道，他巧妙地闡述了基督教學說並論證了其「補儒」立場，博得了士大夫的同情，更掩蓋了傳教的根本目的。以致明代以叛逆著稱的思想家李贄（1527–1602）在對這位「中極玲瓏，外極樸實」的標緻人大加讚賞後，卻不無疑惑地說，「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⁷¹ 叛逆的李贄對周孔之道有著十足的信心，「太愚」、「恐非」的語詞背後依舊是天朝的態度。其 贈西人利西泰 詩曰：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
 剝剝標名姓，山山記水程。
 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
 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⁷²

萬里跋涉的行程描述之後，依然上國心態的展露，「觀國」一語，出自《易經·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正義》曰：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⁷³

69 張爾歧：《蒿庵閒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子部第114冊，卷一，頁265b

70 應搗謙：天主論，姚椿：《國朝文錄》（光緒26年[1900]上海掃葉山房刊本），卷四，頁16。

71 李贄：《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頁35。

72 李贄：《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六，頁246。

73 阮元校刻：《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三，頁36。

虞翻曰：

坤為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尊賓坤，坤為用、為臣，四在王庭，賓事於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⁷⁴

荀勗（生卒年不詳）晉四廂樂歌之猗歎章即有「我有賓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⁷⁵ 李贄的用意正與此同，尾句「中天日正明」的雙關寓意中不無上邦文明的自豪。在李贄與其他文人為利瑪竇所修改潤色的奏章中，更是渲染出一派仰慕華夏的虔誠氣象，其稱，「逖聞天朝聲教文物，竊語沾被餘溉，終身為氓，庶不虛所生……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徑趨闕庭……仰臣先於本國，忝與科名，已叨祿位」。⁷⁶ 謙卑得體的文辭與天朝的俯視心態絲絲入扣，「（萬曆）帝（1563–1620）嘉其遠來，假館授粢，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⁷⁷ 君王的准許，公卿的交友，天朝以一貫的禮儀模式接納了利瑪竇——這位非常中國化的泰西儒生——而不是傳教士。儒者的定位，使得士大夫交往關注集中於知識交流。張瑞圖（1570–1644）贈利瑪竇詩曰：

著書相羽翼，河海互原委。
孟子言事天，孔聖言克己。
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
方域豈足論，心理同者是。
詩禮發塚儒，操戈出弟子。

74 李鼎祚：《周易集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卷五，頁683。

75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十三，頁186–187。

76 利瑪竇：《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收入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2。

77 張廷玉：《明史》，卷三二六，頁1974。

口誦聖賢言，心營錐刀鄙。
門牆堂奧間，咫尺千萬里。⁷⁸

「心理同者是」的判斷延續了陸九淵「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⁷⁹的思路，學理意義上的本源認同，極大地消解了異域學術的文化隔閡，如鄒元標（1551–1624）即在《答西國利瑪竇》中即稱：

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吾國聖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無餘，門下肯信其無異乎？中微有不同者，則習尚之不同耳。門下取《易經》讀之，乾即曰統天，敝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門下以為然否？⁸⁰

儘管有理解的誤差，然在「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儒學精神下，平和的論學交往已躍然紙上。而其排斥佛老的述學立場更博得了士大夫的心理認同，「西極有道者，文玄談更儒。非佛亦非道，飄然自儒風。」⁸¹於中足見利瑪竇在明人心中的西儒形象。直至康熙時，清人尤侗（1618–1704）在《外國竹枝詞》中仍稱：「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⁸²雖然詩中的教堂有著利瑪竇傳教事業的象徵意義，但祭奠的模式依然是中國的傳統，中國士大夫把他看作一位嚮往華夏文明的西方學者，對於宗教觀念淡漠的中國人而言，天主教和佛教並無不同，利瑪竇所隱藏的核心關注就這樣的被中國文化所誤讀。然而，文化理解的誤讀著實減少了意識本位的根本衝突，在中西禮儀之爭之前，都是一種

78 《熙朝崇正集》，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學生書局，1965年），頁644。

79 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三十六，頁483。

80 鄒元標：《願學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4冊，卷三，頁89。

81 汪廷訥：《坐隱先生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第188冊，卷五，頁736a。

82 尤侗：《西堂樂府》，《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第1407冊，頁111a。

融融的氣氛，學術交流之後的傳教工作亦不顯聲色、不被關注地進行著，偶有的反對聲音大多來自對利氏排佛的不滿以及自居正統的一般排外心理。

以利瑪竇、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為代表的傳教士們淡薄名利，遠離女色，禁欲修行與理學人格的契合無疑為他們贏得了人格的尊敬，在重視言行合一傳統視野中，高潔的現實操行甚至給他們帶來了「先生」、「師」的譽稱，以至於論敵鍾始聲（生卒年不詳）亦稱艾儒略「恭慤廉退，尤儼然大儒風格」，⁸³ 而激烈的天主教反對者陳侯光（生卒年不詳）也不得不在其《辯學芻言序》中稱：「近有大西國夷，航海以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潔……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⁸⁴ 親近者，更是師友視之，何喬遠（1558–1631）贈詩云：「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顧雖兼行持，蘆廬但一宿」，⁸⁵ 更以「艾公」相稱，蘇負英（生卒年不詳）詩曰：「吾師海外至」，⁸⁶ 黃鳴喬（生卒年不詳）詩曰：「才能萬里見先生」，⁸⁷ 林紹祖（生卒年不詳）詩曰：「吾師論道烏山前，開卷不空也不玄」。⁸⁸ 由「番僧」而「吾師」、「先生」的稱謂轉化暗示著傳統士大夫對艾儒略的心理接納，此外，如潘師孔（生卒年不詳）詩曰：「獨憐九萬程，畏途安可敷？孰賜吾先生？耶穌意良苦」，⁸⁹ 林一（生卒年不詳）詩稱：「多緣大主恩無外，亦賴吾師志不慵」。⁹⁰ 對傳教事業的關注視角本身即已是交往深入的體現——自然也是傳教士的努力結果。而天啟五年，唐景教碑的出土則成為詩文酬贈的又一關注熱點，如蘇負英詩曰：「荒碑閱陝湧，古

83 鍾始聲：《天學再徵》，收入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頁952。

84 徐昌治輯：《明朝破邪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0輯第4冊，頁401a。

85 《熙朝崇正集》，頁645。

86 同上注，頁677。

87 同上注，頁648。

88 同上注，頁670。

89 同上注，頁673。

90 同上注，頁680–681。

石武榮妍。石鐔聖架跡，碑紀貞觀年」，⁹¹ 謝懋明（生卒年不詳）詩：「碑留十字篆，架隱百年章」，⁹² 吳維新（生卒年不詳）詩「著書千百言，磨碑印十字」，⁹³ 周之夔（1586-?）詩：「中國猶傳景教碑」，⁹⁴ 唐碑中的「十字」有著中、西對話傳統的溯源意義，景教石碑的實物見證無疑延伸了交往的歷史。「古已有之」——自是傳統心理的典範，王化遠播，四方咸賓原是三代、漢唐之尋常事，在久已有之的文明宣教下，「心理本同」自在情理之中，而「本同」的落腳點正是儒家的聖學道統，終極關注依舊是天朝本位。當然，傳統的心理慣性只是字裡行間的隱性流露，贈詩之中凸現的仍是對「西儒」艾儒略的尊敬。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傳教士所獲得的理解與尊敬並非士大夫與之交遊的核心關注，「（傳教士）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⁹⁵ 華人所未道的西方科學和數學方是其最初立足點與吸引力所在，傳教士以天文儀器、時鐘地圖等日常之物由形而下的技術傳播進入形而上的知識交往，無論是徐光啟（1562-1633）「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接納眼光，還是方以智（1611-1671）西學「詳於質測，而拙於通幾」的總體判斷，所體現的均是明末優秀士人對異域學術的積極關注。更應注意的是，西學的形而下傳播路線已在知識結構底層對常識觀念形成了巨大的衝擊，但形而上的儒學譜系卻憑藉天朝意識下的聖學特質，牢固地掌握著知識世界的統治權，其中的危機卻是不言而喻的，一旦國家在交往中嚴重受挫，導致了天朝形象的瓦解，精英們所依賴的學術傳統無可歸依，知識信仰所面臨的則是天崩地解式的崩潰。可惜的是，幾個世紀後，這一切終於不幸地成為了現實。

91 同上注，頁 678。

92 同上注，頁 674。

93 同上注，頁 688。

94 同上注，頁 650。

95 張廷玉：《明史》，卷三二六，頁 8461。

此外，萬曆三大征之一的禦倭援朝戰爭或可稱之為作明代對外交往中的變奏曲，長達七年的入朝作戰，最後因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的突然去世而近乎戲劇性的突然結束。對於這場戰爭，由於戰場遠離中國本土，明代士人的關注視野自然受限，疆場征戰的詩歌記錄大多是由朝鮮詩人來完成的，如李朝詩人李德懋（1741–1793）碧蹄店 即是為明將李如松所作：「天兵癸巳齒倭鋒，鐵馬啼勞膩土濃。未抵輕儂蝴蝶陣，臨風痛哭李如松」；⁹⁶ 朴文達（1809–1888）過振威縣素沙坪，則對明朝平倭總兵麻貴頗有稱許，其詩稱：「八月明南宿雨晴，黃沙漠漠展歸程。鳧與敵國江山在，麻貴新營草樹平。地向煙塵皆廓落，秋高雲日倍清晶。自憐勞碌終何事？白首為儒愧此行。」⁹⁷ 而明人自身詩作亦不過是慣例式的關注，並沒有太多的熱情。如周于德（生卒年不詳）聞王師東援朝鮮 詩稱：

材官十萬欲平倭，司馬何如漢伏波。
 殺氣曉連玄兔郡，將軍夜渡白狼河。
 還須直破伊岐島，莫使虛傳枕杜歌。
 禮樂東藩箕子國，王師急為洗干戈。⁹⁸

習慣的出師稱頌並無特出之處，為「禮樂東藩」，「洗干戈」的出兵動機所凸現的正是明代士人對這場天朝仁義戰的性質認識。而區大相（？–1614）於1598年《紀朝鮮事》所體現的則是對久戰無功的深刻反思，其詩稱：

自有東師六七載，廟堂歲歲議封貢。
 近者群公幸主戰，折將隳軍竟何用。

96 張德秀選注：《朝鮮民族古代漢文詩選注》（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328。

97 同上注，頁320。

98 朱彝尊選編：《明詩綜》，卷五十二，頁2621。

海關芻糧不易渡，五鍾一石勞傳送。
 橫征頗慮空杼軸，轉輸未免妨耕種。
 去年小挫由忌功，今年大衄緣輕縱。
 執事顏行屢見逆，天王威命何曾共。
 封既無成戰失利，公私之積咸哀痛。
 更無一人能畫策，徒有諸僚成聚訟。
 要荒交侵古來有，更於中國何輕重。
 當時止合問曲直，按兵境上不為動。
 朝廷制馭自有道，豈在勞民與動眾。
 奈何誤聽小人計，日以和好自愚弄。
 從此兵端尋歲月，豈知海內為虛空。
 財傾左藏不足惜，民傷萬命能無慟。
 近聞有議留屯戍，老成億度或屢中。
 充國金城上方略，李牧鴈門費邊供。
 年來喪敗咎北軍，弓馬雖嫻備騎從。
 吳越少年習水戰，檣檝輕利過飛鞚。
 儻能訓練三萬人，坐見狡蕃受羈控。
 腐儒何敢與肉食，聊以短章代微諷。
 繞朝勿謂秦無策，中興尚看甫作頌。⁹⁹

士人的心態隨戰事進展而轉移，出兵時的縱橫意氣因戰局的僵持而轉換為現實的關注，務實的思考通常只在受挫的天朝意識中出現，然而，最終勉強的勝利畢竟保全了天朝的顏面，亦掩蓋了由戰爭中的實際弊端所體現的深層危機，因挫折感而產生的反思隨著天朝心態的恢復而褪色。

詠物紀行的習慣模式，天朝上邦的俯視視角一如既往的的延續著傳統詩歌各項功能，從明詩態度中，已足以感知精英階層關注熱情的有限，對外交往中的新鮮成分並未能在天朝心態下的傳統河流

⁹⁹ 同上注，卷五十二，頁 2823。

中激起太多的漣漪。對於成熟的詩歌文體而言，面對一個並不令人興奮與關注的話題，一個無法進入主流文化的討論核心區域，明詩並不會給中外交往太多的關注，僅僅是以其一貫的廣袤視域，慣例般地將其納入詩歌傳統中，不露聲色，波瀾不驚，儘管天崩地解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在此時孕育，但傳統視野中的明詩亦然按照漢唐的規模，在復古與性靈的爭吵中真實地記錄著一代士人心態與文化情緒。

Ming-Era Foreign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Poetry

GUO Wanjin and ZHAO Yin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he M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unique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Ming poetry did not treat these interactions with particular enthusiasm, but mostly retained traditional motifs. Though poems did sometimes describe objects of foreign origin, applying the observational power of traditional poetry, these poems also reflected the contemporary tendency towards “rejection of tribute goods.” Ming poems do no more than admit into the confines of their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Ming foreign relations like Chen Cheng’s embassy to Central Asia, Zheng He’s voyag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arrival of European missionaries. Nonetheless, the observation of these events in Ming poetry places in new perspective the poetic developments of the period.

Keyword: Ming Dynasty poems, foreign relations